

醫療救援隊所開展的一場史無前例的醫療救援，展現了戰時軍事醫學的跨政治性與可移動性，為前線大量平民與士兵提供及時有效的醫療救助。與此同時，為進一步適應中國的戰時條件，第三章說明美、加籍華人在昆明建立了中國第一座血庫，藉由創造性地改造從美國引進的血庫技術，在戰時物資短缺的情況下極大程度發揮了捐血行為的經濟價值，緩解中國民眾對於血液捐贈的文化禁忌，提高血庫的接受範圍與應用效力。第四章通過闡述緊急醫療服務培訓學校（EMSTS）的歷史，探索戰時中國軍事醫學教育的政治性。EMSTS 作為醫學教育機構不僅促進了醫務人員數量的大幅擴張，也滿足了戰時醫療實踐的大量需要。而隨後發生在聯華救濟會（United China Relief）與學校創辦人林可勝之間的領導權博弈，也揭示了依賴美國資助的不穩定性。伴隨著二戰結束，海外華人又因國內兩黨內戰的不斷升級而逐漸分化，為戰後兩岸醫學的重建帶來了嚴重的財政危機。第五章即介紹了林可勝是如何通過合併中國的競爭醫療機構、徵用戰後日本留下的資源、飛往美國尋求捐贈者和盟友等方式以維持生物醫學中心的生存。

戰前海外華人領導下的知識應用與制度建設，很大程度上借鑑了西方生物醫學，這也是這一群體的海外教

育背景所決定的結果。而伴隨著二戰爆發與軍事醫學的引進，原本精英式、基於城市的實驗室生物醫學逐漸轉向流動的、基於實地的適應性戰時醫學實踐，表明了海外華人將醫療大規模引入戰爭前線的決心。軍事生物醫學的新方法，不僅具有在戰時中國背景下挽救數百萬生命的醫學實績，也為當地引進了有計劃的訓練制度、專業教育機構與醫學課程等客觀資源。與此同時，這種全民醫療和國家醫學理念的價值觀更為 1949 年後的海峽兩岸留下了重要遺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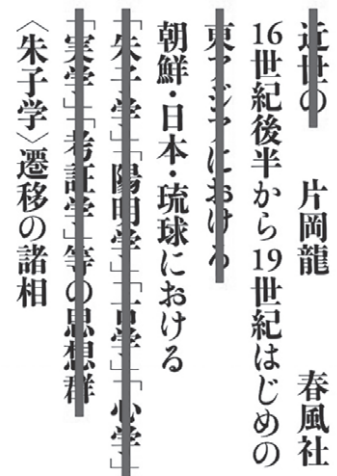
總而言之，本書角度新穎，史料翔實，通過追蹤海外華僑的戰時醫學貢獻，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傳統的西方醫療援助勢力的關注範圍，挑戰了世界歷史書寫中歐洲中心主義的霸權，並將目光從精英醫療體系的分析，轉移至軍事醫學及鄉村醫療等鮮少受到重視的話題，將生物醫學發展進程與政治動蕩相結合進行敘述分析，可謂全球醫療史領域的新突破。正當我們面臨著 21 世紀一場空前絕後的流行瘟疫之際，這項研究更提供了有力的歷史啟示與教訓，並提示我們現代國家醫學的發展必然與全球醫學實踐有著不可或缺的緊密聯繫。（毛可欣，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碩士生）

16 世紀後半から 19 世紀はじめの朝鮮・日本・琉球における〈朱子学〉遷移の諸相

片岡龍

神奈川：春風社，2020

312 頁，ISBN 978-486-1106-81-1



近世東亞思想世界以朱子學蔚為大宗，在不同地域更是作為思想主流的存在（如朝鮮王朝），或是扮演思潮向「近代」轉化的基礎（如幕末日本）。然而，相較歷來研究主要聚焦在中國朱子學的對外輸出，乃至中國朱子學與域外朱子學之比較研究，也就是側重於思想「根源性」的探討，近來學界開始關注到朱子學在傳入各地域後，為適應不同文化風土而產生的思想「受容性」。

東北大學片岡龍教授新著即試圖將中國原生之朱子學視作一種「文明事象」，並援引梅棹忠夫「生態史觀」底下的「遷移」(succession) 觀念，藉以指認近世東亞世界在朱子學這一偌大思想資源影響下，其思想史發展脈絡應是由作為「主體」的日本、朝鮮、琉球等地儒者，與作為「環境」的朱子學交互影響下所呈露之結果。尤當注意的還有朱子學在傳入日本、朝鮮、琉球之前，各地不同的學術風氣、思想土壤以及宗教信仰。

日本的特殊性乃在於朱子學傳入前係以佛教為主流思想，但於此同時，西教（キリスト教）、蘭學、神道教亦對當時思想土壤有著一定程度的浸潤，因而士階層（武士）在面對舶來的朱子學時，仍持有不同態度。如江戶初期脫佛入儒的藤原惺窩即以朱子學之「理」（理一分殊）作為「天道」展現，並以此來對抗デウス（Deus）、佛教等超越自然的觀點。向來被視為日本陽明學開山鼻祖的中江藤樹則同樣挪朱子學的「理」，將之解釋為「神理」，以此來繹解《孝經》、確立太乙神信仰，此一近似西教的人格神信仰，同時又因為提倡「孝」而能夠契合日本的神道信仰。

時序發展至江戶中期，講求實學、古學取向的儒者伊藤仁齋及荻生徂徠，則明顯開始具備反朱子學的思想底色。仁齋通過鎔鑄《論語》、《孟子》，訴諸回歸古代語境（古義）以理解聖人之言，以求跳脫朱子以性理學角度來施予經典之注解，主張「心性」(人道)與「經世」（王道）不可兩分，強調人倫世界方是道德實踐之場域，

一反朱子對「道」、「理」所賦予的形上設定。徂徠則指出聖人之「道」應是六經所承載之禮樂刑政，故應該通過「知（敬、奉、畏）天命」的方式來奉行「先王之道」，以此反對朱子所言「道」即「理」。

相較於江戶日本，琉球儒者蔡溫雖同樣具備實學傾向，但並不同於仁齋所言使「天道」和「人道」分離；亦不若徂徠言「道」與心性的分離，而是強調「心」與「天」之間係作為活物世界的存在，且因應「氣」的次元（社會環境）變化來重新定義「心」與「天」的關係。

論及朝鮮王朝的發展，李退溪對朱子學的理解一定程度上源自對明代醫書的吸收，並由此來確立「心」觀，其後更是影響到他對「理」（「理動」、「理到」、「理發」）乃至對「天命」的看法。另一方面，由於朝鮮王朝獨尊朱子學，視陽明學為異端，如張旅軒即挪用朝廷之公共概念來與性理學結合，進而衍化出「公共之性」、「公共之義」、「公共之心」等朱子學範疇下未見之概念，以此重申「性即理」來與陽明學「心即理」抗衡。

東亞儒者除受容朱子學、反朱子學（古學、陽明學）外，提倡儒學與西教調和的觀點亦多有所見，如江戶中期考證學者大田錦城及朝鮮王朝實學家丁若鏞。兩人皆嘗試將儒、耶融於一爐，除聖人觀受西教影響外，對於「天」的認知，亦同樣衍伸出「知天（天地為活物）」與「事天（「昭事上帝）」的看法，此概係以朱子學之「理」來對西教之「靈／實」概念進行捕捉的緣故。

綜觀全書，片岡龍探討朱子學在近世東亞思想世界所開展的機能性與作用性，從而論證應當視朱子學影響所及的東亞儒者為具備「主體性」之思想個體，而非僅將之視作中國朱子學的紹述者。此一識見，不但體現了近世東亞思想世界的多元駁雜，同時亦使學術研究視角有所反思，開始自不同文化體系內部重新審視朱子學的受容與展開。（郭雨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碩士）